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研究所
歷史學系
合編

歷史學報

第二十期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出版

歷史學報

第二十期

目錄

專論

史學三書作者的生平與其著作之關係比較	林時民	一
傳統中國醫界對成長發育現象之討論	熊秉真	二七
科場競爭與天下之「公」：明代科舉區域配額問題的一些考察	林麗月	四三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對於社會主義之初步反應及共產制度之適然想像	王爾敏	七五
論康有為的集權思想	雷慧兒	九五
林森對辛亥革命及民國政治的貢獻	李國祁	一三三
民國廿一年國難會議與訓政憲政之爭	何萍	一五五

書評

《夏史夏文化研究書目》評介	王仲孚	一八七
評介邁克爾著「美國的對日佔領政策——亞洲冷戰的起源——」	陳豐祥	一九七

研究與討論

近四十年南宋末政治史中文論著研究	方震華	二〇七
《詩經》滿文譯本比較研究——以〈周南〉、〈召南〉為例	葉高樹	二一九
中日有關明代白銀史研究之回顧	鄭永昌	二三五

史學三書作者的生平

與其著作之關係比較

林時民

一、前言

所謂「史學三書」，是指唐代劉知幾的《史通》、宋代鄭樵的《通志略》及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三書之並舉，在清末以前，似未聞如此，有則自梁任公始（註一），但任公實際並未予以專有名詞化，不過已略見機兆之先。其後，前輩學者張舜徽踵繼其武，出有一書即勒顏曰《史學三書平議》，於焉斯名始定。張氏因此可謂是正式標舉「三書」名稱的第一人。本文擬承襲此名稱之舊統，首先針對三書作者的生平大要與三書成書的關係作一番比較。大抵劉、鄭、章三氏享年都在六十歲左右，差異不大，雖三人生平際遇有不同的細致，但大致可以二十歲做為一個段落，有機地分列早、中、晚年三個時期，來審視三氏著力於史事的同異，特別是尋出其所以成為一代世宗的共通性緣由。

文中三個階段分別提敘出身門風、近史宿性、仕官交遊、基本性格、著述志趣與懷才不遇以作為觀察三氏在撰述其不朽名作過程中的重要因素，並略比較之，俾以較能深切瞭解三氏及三書之重要史論。

二、早年：出身門風與近史宿性

三氏的生卒年代，史籍均有記載。《新唐書》記劉知幾云：「生於唐高宗龍朔元年（公元六六一年），卒於玄宗開元

九年（公元七二一年），終年六十歲。徐州彭城人。」（註二），彭城，在今江蘇省銅山縣。鄭樵的生平，因《宋史》未詳載，故後世學者力予考證，推知生於宋徽宗崇寧二年（公元一一〇三年），卒於紹興三十一年（一一六一）。係興化軍莆田縣人（註三）。興化軍屬於福建路，下有三縣，莆田即其中之一（註四）。有關鄭樵的里邑籍貫，則史書向無異說（註五）。章學誠係生於清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卒於嘉慶六年（一八〇一），享年六十四，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人（註六）。從地域的因素來看，三氏分別生於今江蘇、浙江、福建，三省皆近於沿海，比起其他地區，經濟較善，文風亦盛（註七）。而日蘇浙閩三省在唐宋清三代劉鄭章三氏生時，並無天災人禍，對三人之治學而言，可謂先天環境甚佳（註八）。

另者，從家庭門第來看，三氏皆可謂出身仕宦之家，亦有助於其致學。詳細言之，三氏皆具家學淵源，甚至可追溯到其遠祖即世為儒宗，光耀史牒的脈絡，但就彼等所受最大影響而論，則仍是父祖兩代。知幾從祖劉胤之，不僅有儒學且曾預修國史，實有上承遠代祖先，且下啓知幾一代注重史學門風的作用（註九）。父親劉藏器則是學行方正，時人稱賢，對知幾兄弟課教甚嚴（註一〇）。鄭樵祖父鄭幸為熙寧三年進士，父國器，係政和年間太學生，曾鸞地助築蘇洋陂堤，甚受鄉里敬重（註一一）。章學誠之祖如璋是候補經歷，「惇行原德，望於鄉黨，尤嗜史學，晚歲閉門卻掃，終日不見一人。取司馬《通鑑》，往復天道人事」（註一二）；其父鑣，乾隆七年（一七四二）進士，於實齋曾親自授讀（註一三）。由上可知，三氏之所以能卓有所成，長於治史，與其家學門風深有關係。

再就三氏之同輩兄弟而言，知幾兄弟六人，俱進士及第，文學知名，可謂一門數傑，其兄弟於受學時，對知幾進學有益（註一四）。漁仲則有從兄景章，時稱二鄭，與其在人生抱負、學問志向及學術興趣各方面，相互切磋，十分相得（註一五）。實齋劉與鄭兩人情況不同，他沒有兄弟，僅有一姊，後有一妹。不僅乏昆仲以勵進，且幼年多病，資質稚魯。至十四歲，四子書猶未卒業（註一六）。其父親之友朋，咸為其父無後憂，可見其嚴重之一斑。然自十六歲以後，智慧漸開，知識漸通，性情漸近史學，不甘與俗學為伍（註一七）。二十歲時，購得吳注《庚開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實齋之父抹去其注，而評於下曰：「望桃花於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氏於彼時便有領悟。回視吳注，意味索然。自後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為訓詁牢籠。雖時有鹵莽之弊，而於古人都能另有所窺（註一八）。此亦可佐證章氏為學風格及其家學淵源。

氏曾自言：

二十歲以前，性絕駘滯，讀書不過三二百言，猶不久識，爲文字，虛字多不當理，廿一二歲，駸駸向長。縱覽群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乃知吾之廿歲後與廿歲前，不類出於一人，自是吾所獨異。（註一九）

二十歲似是實齋生涯中的一分界線，前後迥異。其近史之性情在十六歲至二十歲之間，已完全顯露。而劉知幾則更早，《史通·自敘》中知幾曾言：

予幼奉庭訓，早游文學。年在紉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爲諸兄說之。因竊嘆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

「先君奇其意，於是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意略舉。（註二〇）浦起龍以爲知幾與史爲緣，殆由宿植而來（註二一）。所謂「宿植」，用今語釋之，即潛藏於本身之內的能力，亦即天生的稟賦，這種稟賦實即西人所謂自然傾向（natural tendency）。知幾之傾向於史，不僅在受蒙初學之時，表現無遺，同時在邁入青年時期，也就是過了上文所謂的「年甫十有二」後，還能以此與生俱來的宿植之優，「創通全史，胸貯已白」了。（註二二）

在十二歲讀畢《左傳》後，知幾迫切需要知道獲麟以後的史事，來廣增異聞。因此又續下《史記》、《漢書》、《三國志》等書。此後即能觸類旁通，洞悉古今之沿革與曆數之相承。到他十七歲時，則已窺覽「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的所有史籍，而且一點也不必假手師訓（註二三）。若非知幾天性近史，且其資聰悟穎，焉易有其功？後來能「爲史臣，再入東觀（註二四），歸結其原因，亦拜早年傾向於史之賜。

不惟如是，《史通·忤時》亦云：「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註二五）以及《舊唐書·本傳》：「子玄掌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爲當時所稱」，又：「子玄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者，必居其職」（註二六），在在都證明知幾近史的傾向大過於其他方面的習性。而這份自然的傾向，不但在早年顯像特強，而且貫穿其青壯年時期。知幾長大成人之後，從喜好詩賦的興趣轉移到史事，以及壯年以後「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

的志向改變（註二七），都是天性近史在背後作祟的結果。

由此觀之，兩人近史特性在早年即已創發，惟劉氏幼年聰明而章氏愚魯而已，以此質諸鄭氏，雖無現成的資料證明其早年即已近史，但從後來的〈獻皇帝書〉裡自述其為學經歷時可知：

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結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遠矣。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註二八）。

可以知道在其十六歲護喪回鄉之後，即在夾漈草堂發憤讀書、訪書、著書，僅由此亦可知道史學經學乃至其他學問如金石圖譜、天文地理、校讎目錄、言語文字都在鄭樵追求行列之中。無疑地，鄭樵近史的宿性雖較劉、章兩氏不明顯，但沈潛於學問的興趣似乎遠大於劉、章兩人。

由上面所述，從發展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三氏父祖三代以來的門風家學以及近史的自然傾向，是鑄就三氏撰述等身，擅名百代的首要資產。

三、中年：仕宦交遊與基本性格

到了二十歲也就是弱冠之後，三氏的際遇便不相同了。劉知幾在二十歲左右即進士及第，最初派任為獲嘉縣主簿，是一名正九品下的小地方官，對劉氏而言，這是他首度踏出家庭而邁入社會或宦場之中。換言之，知幾二十歲左右，家庭對他的影響力已逐漸由社會所取代。

知幾在獲任之後的十餘年間，未曾易職他就（註二九）。社會上也沒有兵荒馬亂，因此他可以突破弱冠之前，為了要求仕進，不能專心向史的缺憾，而得以「旅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註三〇），這對他在做學問的層次上，顯然有很大的進益。而學問的底子，視野的廣度，都因他在這段不算太短的時間內，留任主簿一職，擁用完全充分的讀書自主性，以及不必再為功名所網羅而方能鞏固並且拓展出甚多。弱冠之前的劉知幾，其史學基礎固然是穩固的，但日後之能參預史職與具備撰述史書的功力，

實得力於初仕任內恣情披閱公私典籍與鑽研穿鑿雜記小書所得來的兼綜工夫。也就是說，至此之後，其史學知識與理念才達到批評、成熟與超然的境界。

踏入宦場後的前十年，除了再充實自己的學力之外，劉知幾並沒有交到使他認為足以研討治學的朋友，如有則在三十歲以後，而這些朋友，在其心目中都是很有份量的。《史通·白敘》曾說：

及年以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樞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註

三一）

而立之前，知幾何以缺少知音？且於後文再述。此處擬先檢視所稱七友，究係何許人士？

徐堅，少好學有敏性，遍覽經史，性寬厚，文章敦實，多識典故，先後修撰《三教珠英》、《格式氏族》及《國史》，甚得時論稱譽。他很重視《史通》，曾說：「居史職者，宜置此書于座右」（註三二），並編有《初學記》卅卷，主張良史應當「不虛美、不隱惡，善以勸世，惡以示後，所以暴露成敗，昭彰是非」，與劉知幾在《史通》〈曲筆〉〈直書〉〈惑經〉〈忤時〉諸篇的論說，宗旨相符。

朱敬則，早以辭學知名，個儻重節義，長安三年（七〇三）曾上〈請擇史官表〉：「伏以陛下聖德鴻業，誠可垂範將來。倘不遇良史之才，則大典無由而就也。且董狐、南史豈止生於亡代而獨無於此時乎？在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註三三）。這項見解與《史通·覈才》所論者近同。

劉允濟曾以鳳閣舍人修國史也發論：「史官善惡必書，言成軌範，使驕主賊臣，有所知懼，此亦權重理合，貧而樂道也。昔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視之如浮雲耳。但百僚善惡必書，足為千載不朽之美談，豈不盛哉！」（註三四）與《史通·曲筆》指摘「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屬於同一論調，連事例兩人所舉也是相同的。

薛謙光由《兩唐書·本傳》知道他「博涉文史，每與人談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少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註三五）。

吳兢在《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在外修史〉條有：「（開元）十四年（七二六）七月十六日，太子左庶子吳兢上奏曰：『臣往者長安、景龍之歲，以左拾遺起居郎修國史，時有武三思、張易之、張昌宗、紀處訥、宗楚客、韋湓等，相次監領其職。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憲章，苟飾虛詞，殊非直筆。臣愚以爲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遂潛心積思，別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於私室。』」可見吳兢之良直。與知幾及前述諸人相同（註三六）。

元行沖則「博學多通，尤善音律及調話之書」，撰有《魏典》卅卷，《群書四錄》及《注孝經疏義》（註三七）。子玄立說，多受行沖影響。

至於裴懷古，是唯一不參史局之人，故最後才提到。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兼，爲國名將云」（註三八），氣質與知幾等人亦甚相類似。

由以上所述，可歸納出知幾友人的共通點，大致是：（一）好學喜史：如徐堅「好學，遍覽經史，多識典故」；劉允濟「博學，善屬文」；薛「博涉文史」；元「博涉多通」；吳「勵志勤學，博通經史」；（二）耿直孤介：元行沖「性不阿順，多進規誡」；朱敬則曾爲魏元忠被張易之兄弟構誣，將陷重辟一事，獨抗疏申理，顯示其耿直無畏權勢；劉允濟在垂拱四年（六八八年）明堂初成時，曾奏上《明堂賦》以諷，武則天不怪之，反手制褒美。中興初，授青州長史，爲吏清白，甚得長官之薦信；吳兢、裴懷古之良直廉信，正如前述，不必多贅。凡此皆與知幾之性格同一類型，故而甚易形成諸人心目中視彼此爲「我群」(We Group)，而在學問人品方面，互有砥礪之功。《史通》之撰作，亦因而有其關聯性。

其實，早期知幾在入京之初，尙抱有「守愚養拙，怯進勇退」的思想（註三九）。但入史館後，竟敢直言當道，可能即是與這些相知諸友的相互砥礪與激發鼓勵，才有重大改變的。正因爲他們具有共同的特色，故白壽彝認爲知幾及其友朋形成了一個學派，並肯定此學派思想的進步性，對八世紀的思想史研究有益（註四〇）。雷家驥則以爲他們論道講學的背景都在所謂的史館修注院，故乾脆賦予一個「館院學派」的名稱（註四一）。遼耀東在知幾諸友的著作流傳不廣的條件下，更進而認爲知幾是他們史學思想的總代言，《史通》則是他們史學經驗的結晶（註四二）。

至於鄭樵在二十歲至四十歲之間的宦歷，則殊少足述者。原因出在他自少年時代，即于宦途不甚熱心，十六歲父親亡故，扶柩回鄉之後，便謝絕人事，與其弟鄭柚從兄鄭柚築南豐草堂閉門讀書，與山泉林野爲伴。後因弟柚早逝，厚樵兄弟

乃遷夾深山，因陋就簡，築草堂三間，一起以切磋學問爲樂，無意仕途，因草堂周圍綠蔭掩映，碧溪環流，田疇交錯，景色優雅，鄭樵乃潛心研究成就一代史學。鄭樵故宅，大陸有關方面已予重新修繕（註四三）。其詩文集《夾深遺稿》曾留下草堂題記和詠詩（註四四），吟咏山間景色，抒發胸懷志趣，頗具隱逸情愫。厚樵兩人才氣抱負相當，兄弟感情也十分相契，可謂志同道合，常一起研讀論辨，致寒暑不分，飲食亦忘。史稱其喜「遊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註四五），可見其致學專深，用力精勤。然靖康二年春（公元一二二七年），鄭樵二十四歲時，發生靖康之難。時局的動盪，激發了兄弟兩人的民族氣節與愛國情操，先投書予江給事常，後又兩投宇文虛中樞密書（註四六）。兄弟兩人雖受賞識，唯終未獲用，只得重返山林（註四七）。後來鄭厚于紹興五年（一一三五），「再舉禮部，奏賦第一」，從此走向宦途，但鄭樵篤守本志，放野山林，依然「風晨雪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而誦記不絕」（註四八），雖有謂三次被舉薦爲孝廉，兩次被推爲遺逸，但皆不動心（註四九）。他矢志不渝，獻身於讀書著述。三十五歲那年，即南宋高宗紹興八年（一一三八），他開始想寫一部繼《史記》之後，貫通古今的通史。在《寄方禮部書》裡，自述：

諸史家各成一代之書而無通體，樵欲自今天子中興，上達秦漢之前，著爲一書，曰《通史》，尋紀法制。嗚呼！三館四庫之中，不可謂無書也。然欲有法制可爲歷代有國家者之紀綱規模，實未見其作，此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營營之業，營營之志，幸禮部侍郎而成就之。（註五〇）

其宏大理想，完全披露，祇願會通百家之學，集天下之書爲一書。爲此，他奮鬥了三十年，歷盡艱辛，始終不改。他屢辭任官，甚至自負到不願與當時一般士大夫交遊應酬。以爲他們「齷齪不圖遠略，無足與計者」（註五一），這可以說他個性上耿介自守的表現，也是他草堂求學時期所表現的延續，多年來鄭樵志向一直不變。不就官職，甚至不曾與試，可以說自始即是他的性格上的一部分，而他抱持隱逸的心態，隱居深山之中，謝絕人世交往，正是他著述通史諸略的憑恃。一旦失此憑恃，鄭樵即不復爲鄭樵。

章學誠在青壯年階段的表現平平。其史學素養已漸趨成熟，但不爲外界所識，他曾回憶：

廿三四時所筆記者，今雖亡佚，然論諸史於紀表志傳之外更當立圖，列傳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惟當時見書不多，故立說鮮所徵引耳，其識之卓絕，則有至今不能易者。（註五二）

氏二十三歲（乾隆二十五年，公元一七六〇年）赴北京應順天試，不第；直至三十一歲時再試，始中副榜。在這八年間，章學誠一直在國子監中落落寡合，每試輒被斥落，祭酒以下多看他不起。乾隆三十年應鄉試時，同考官沈業雄推薦其文章，但未被錄取。沈氏甚爲之惋惜，乃延聘至家中教其子弟。學誠因而得以努力學習和寫作。同年，始觀《史通》（註五三），並在生活上出現一個轉捩點，即拜翰林院編修朱筠爲師，學爲古文，甚得朱氏贊揚。此時的學誠，由於「朱先生始言於衆，京師漸有知名者，彼時立志甚奇，而學識未充，文筆未能如意之所向」（註五四）知幾在他這個年紀，也仍然在「借閱公私典籍」之中，尙未擔任史職。此後，並與邵晉涵（二雲）、周永年（書昌）、任大椿（幼植）、洪亮吉（稚存）、汪輝祖（龍莊）、黃仲則等學者交遊，其中和學誠最要好的朋友要數史學家邵二雲。兩人論史，契合隱微（註五五）。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氏三十五歲，開始撰作《文史通義》，其致朱春浦書有云：

夫人之相知，得心爲上。學誠家有老母，朝夕薪水之資不能自給。十口浮寓，無所棲泊。貶抑文字，稍從時尚，則有之矣。至先生所以有取於是而小子亦自惜其得之不偶然者，夫豈紛紛者所得損益？是以出都以來，頗事著述，斟酌藝林，作爲《文史通義》。書雖未成，大指已見辛楣先生（按即錢大昕）候牘所錄內篇三首，併以附呈。先生試察其言，必將有以得其所自。（註五六）

此中透露《文史通義》始於是年，並且知道學誠仍然生活非常困乏窘迫。《上辛楣宮詹書》云（註五七）：

學誠從事於文史校讎，蓋將有所發明。然辯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故不欲多爲人知。所上敝帚，乞勿爲外人道也。顯見學誠的見解，不合時宜，但已有幾分自信。可惜錢大昕似未能賞識其史學見解。而邵晉涵則甚稱讚學誠的《文史通義》，曾云：「君每見余書，輒謂如探其胸中之欲言，間有乍聞錯愕，俄轉爲驚者不一而足」（註五八）。學誠文集與邵氏論學之書信很多，彼此知交。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氏三十六歲。是年應和州知州劉長城之聘，編纂《和州志》，次年成書，是他的第一本著作。此年夏天，氏在寧波遇到戴震（東原），兩人論史事，意見多不合。余英時教授對兩人的學問路向已有一番論述，甚見精緻，當備參讀（註五九）。茲舉一例，學誠在杭州，曾聞戴震與吳穎芳談次痛詆鄭樵《通志》，其後學者頗有警警。氏乃因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其文上溯馬班下辨《文獻通考》，皆史家要旨。此文初名《續通志敘書後》，後易

名爲《中鄭》，即因戴氏而作，今反成爲是了解章氏史學思想的重要文獻之一。到三十七歲時，撰有《和州志》四十二篇，並輯有《和州文徵》八卷。

乾隆四十年乙未，氏三十八歲，家益貧，而交遊益廣。此時學識大有進益，但爲了求功名，不得不分出精力準備科考。翌年，仍因居北京，援例授國子監典籍。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氏四十歲，因周震榮之介紹，主講定武書院，並受聘主修《永清縣志》，秋入京應順天鄉試，因主考官梁瑤峰惡經生墨守經義，束書不觀，乃發策博問條貫，雜以史事，以規宿抱。學誠反因此得以發揮，榜發中舉。梁氏在考後對他說：「余闈中得子文，深契於心，啓彌封，知出吾鄉，訝素不知子名。詢鄉官同考者皆云不知。聞子久客京師，乃能韜晦如是！」（註六〇）這個「韜晦」兩字可以看出多年來學誠的性恪。以他稚年駱滯而且多病，青壯年學仕兩途的崎嶇坎坷，如國子監時多爲考官斥落，如他雖性近史部，但乾隆三十八年，其師朱筠入《四庫全書》館爲纂修官，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等皆應徵入館纂修，然章氏猶未稱意。如四十歲左右始舉科業，但生活仍然幾陷絕地，其個性若不有幾分執著，且不狂囂傲人，恐更難以度日，如此，則可明白梁氏所評章氏之言，洵爲至論。而且，我們亦以爲學誠有此個性，也是長期所累積而極爲自然的發展。其實，前述的鄭樵也具備這份特質，他甚至僻居一隅，幾如隱逸，韜晦的工夫猶在學誠之上。

然而知幾的性格特質則不在此，而在其「正直界岸」（註六一），知幾何以三十歲以前，缺乏道業相知的朋友？或可從其性格因素來尋繹之。

知幾幼時讀書即常有創獲，素不爲古人之言見所拘泥，他第一次被大人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即表現在他二十歲以前，「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之事（註六二），雖然當時知幾頗爲之赧然自失而無辭以對，但這份高超的悟解能力，在其後讀到張衡及范曄的書時，終於肯定己見爲是。往後「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註六三），無奈世之庸俗者多，如知幾及其朋輩者，蓋不多見。以氏之資材高妙，每能發明新義，兼由遍尋史籍嗜讀如命之事來看，知幾三十而立前後，常以無可言之朋友相交爲憾，似是自然不過之事。就此而言，鄭樵以爲一般士大夫「齷齪不圖遠略，無足與計者」也是相同的道理。

知幾的賦性峭直，傲岸稜角，又處處可見。他在《史通·忤時》篇說：「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媪預政，士有附

麗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附會，取擯當時」又說：「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奸回，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惟其無所附會，故而一爲主簿，十餘年未曾陞遷；一爲中允，又四年不除（註六四）；及供史職，宗楚客又嫉其正直（註六五）。

緣由其性格之方正，難以俗同，而居史官又久，凡近三十年，故有後來《史通》之作。

四、晚年：著述志趣與懷才不遇

對於三氏來講，四十歲以後迄於六十歲的廿年間，是三氏在史事成就的最重要的階段。三氏的平生代表作都成於此一階段，然而爲何撰作其書，又與三氏在這段期間之內的懷才不遇有很深的關聯。

首就劉知幾而言，武后聖歷二年己亥（公元六九九年），知幾入京爲定王府倉曹（正七品上），與徐堅、徐彥伯、張說等同修《三教珠英》，修完之後隔年即擢升爲著作佐郎兼修國史，開始與史館結緣，是年爲武后長安二年壬寅（公元七〇二年），知幾四十二歲。長安三年，擢升爲門下起居郎，即爲「左史」，撰起居注，後奉詔修《唐史》，但《唐史》之作，多非知幾本意。《史通》裡的「五不可」（註六六），即針對史館的各種弊端而發。知幾知友吳兢亦預其事，多以曲筆爲憾。後在外修撰《唐春秋》《唐書》；另朱敬則亦上疏請擇史官，其中有「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及「超加美職，使得行其進」諸語，蓋爲知幾而發（註六七）。是年七月，鄭惟忠嘗問知幾以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之故，知幾提出「史才論」，謂須有才學識三長，三者難兼，故史才少。此論成爲知幾的千古灼見。

武后長安四年甲辰（公元七〇四年），擢鳳閣舍人，暫停史職。是年，作《劉氏家乘》及《譜考》。《譜考》按據詳明，卻爲流俗所譏。中宗神龍元年乙巳（公元七〇五年），知幾四十五歲，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兼修國史，並奉令修《則天實錄》。此時監修貴臣仍是武三思、宗楚客等人。這些恩倖貴臣既無學行，又猜忌正士。知幾及其友人堅持據事直書的原則，自遭阻礙，故其理想抱負都無法實現，終致引起他「著述立言」「商榷史篇」的念頭。《自敘》篇中知幾便明確說出：

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中宗李哲）即位，又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柄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美志不遂，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註六八）

又《新唐書·劉知幾傳》亦提及《史通》撰述於中宗神龍元年：

始，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註六九）

知幾以爲雖「見用於時」，卻又觸處荆棘，難以實現宿願。載削之餘，故退而私自撰述。就此以觀，知幾比起其他兩氏，仍屬幸運，知幾的懷才不遇，係受制於史館官修體制以及監修總官的不學無行，但至少仍見用於時，得入史館。鄭、章兩氏則連「見用於時」都不可得。若再細分，鄭氏長年久居山中，茹素含辛，私著史冊，仍受朝廷制令的拘制，可謂一波數折，頗不順遂（註七〇）；而以章氏之才，卻始終爲人作嫁，編撰地方志書，不得豫入史館，參修一國之史。且長久爲一家十口生活所迫，輾轉流離，可謂顛沛造次極甚！又似是三氏中之尤者（註七一）。故美志不遂、懷才不遇是三氏各自撰述其畢生代表作的一大原因。

中宗景龍四年庚戌（公元七一〇年），《史通》編次成書（註七二）。但時人共譏其失，因爲《釋蒙》以自陳，並以揚雄自擬：

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晒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爲愚。……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誚之。余著《史通》，見者以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註七三）

《釋蒙》惜已佚失，無由考閱，但由此亦可知知幾對《史通》充滿自信，不爲俗塵所搖撼，而後證明其堅持是正確的。

玄宗開元四年丙辰（公元七一六年），知幾與友吳兢撰成《睿宗實錄》、《則天實錄》、《中宗實錄》，共七十卷。知幾受封居巢縣子（註七四）。

玄宗開元九年辛酉（公元七二一年），知幾年六十一，因長子犯事配流，知幾詣執政訴理。因犯上怒，貶授安州別駕，旋卒，年六十一。知幾卒後一年，子劉餗錄上《史通》，玄宗贈以工部尚書（註七五）。

綜上所述，足見其稟性峭直，稟岸不苟，與時俗相違以致抑鬱憤歎，其傳世代表之作卻因此而成。

至於鄭樵，從本文第一節所述，已知他：

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家，欲討六藝之文，而爲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忽忽三十年，不與人間流通事，所以古人之書，稍經耳目，百家之學，粗識門庭……（註七六）。

他的學問淹通，除史學、經學之外，當世一般學者所忽略之圖譜、語言、文字、禮樂、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曆數、校讎，他都有研究（註七七）。由於他一向隱居於夾漈山，與大自然爲伍，故其學問能夠理論與經驗並具。《通志·昆蟲草木略序》云：

臣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景弘心。結茅夾漈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註七八）

又：

天文藉圖不藉書，……圖一再傳，便成顛錯。……臣向盡求其書，不得其象，又盡求其圖，不得其信。一日得《步天歌》而誦之，時素秋無月，清天如水，長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數夜，一天星斗，盡在胸中矣。（註七九）

可知他一向重視實學。這是他「山林三十年，著書千卷」的一貫風格。

高宗紹興十八年（一一四八），樵四十五歲，是年春，徒步二千里至臨安，獻書予皇帝，凡四十二種，並上《獻皇帝書》直陳其獻書志願與動機，其書云：

臣竊見兵火之餘，文物無幾，陛下留心聖學，篤志斯文，擢用儒臣，典司東觀。于是內外之藏，始有修理，百代之典，煥然可觀。臣伏睹秘書省歲歲求書之勤，臣雖身在草萊，亦欲及茲時效尺寸。

首先他希望參與秘書省求書的工作，其次他亦希望其著述得以留傳，因此他又說：

奈秋先蒲柳，景迫桑榆。兄弟淪亡，子姓亦殤。惟餘老身，形影相弔。若一旦倏先朝露，則此書與此身，不惟有負

于生平，亦且有負於明時。

他擔心三十年著書的苦心將無可存留，故後來在《上宰相書》時又再次發出「無子弟可授」的感慨。結果差幸得到朝廷的嘉納，可以「詔藏秘府」，使鄭樵得到極大的鼓舞。隔年（四十六歲），回到莆田老家，仍在草堂講學著述。惟聲名較前為大，從學弟子一時增至二百多人（註八〇）。四十七歲時（一一五〇），上宰相書，言明希望能夠修纂一部通史，「其書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書為一書」。他一直想寫一部繼《史記》之後，貫通古今的通史，這可說是鄭樵最高的理想與志趣。鄭樵在上書奏檜後，即開始撰寫《通志》，直到紹興卅一年才完成。

紹興二十七年，工部侍郎兼侍講王綸和侍講賀允中舉薦他：

興化軍進士鄭樵，耽嗜墳籍，杜門著書，頃年嘗以所著書獻之朝廷，降付東觀。比聞撰述益多，恐必有補治道，終老草布，可謂遺才。望賜召對，驗其所學，果有可取，即乞依王贛、鄧名世例施行，庶學者有所激勵。（註八一）

次年，高宗便于行在召對鄭樵，鄭樵藉此奏言：

臣取歷代史籍，始自三皇，終於五季，通修為一書，名曰《通志》。參用馬遷之體，而異馬遷之法。謹摭其要覽十

二篇，名曰《修史大例》。（註八二）

當時高宗說：「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派，何相見之晚耶？」遂授迪功郎、禮兵部架閣（註八三）。話似頗為賞識，實際卻未能破格重用。且不久之後又遭御史葉義問所彈劾，改監潭州南岳廟。鄭樵大失所望，乞求還山，於是高宗下詔給與筆札，歸山抄寫《通志》。

鄭樵回家之後，專心撰述，在過去陸續寫妥的舊稿基礎上，經過一番整理審訂，刪繁就簡，大致費了三年時間，終於完成《通志》全書的編纂工作，實現會通衆史，集天下之書為一書的宿願。由上可知，《通志》從準備到完成約費十年時間，此點與知幾之《史通》約略相當。

紹興三十一年冬，樵帶著畢生心血凝鑄的《通志》稿本，欲獻書皇帝，並作有《上殿通志表》，表云：

願臣修史之本末，盡出聖訓之緒餘。觀彼春秋，默略四時之氣；較於班馬，似有一日之長，唯茲編摩，豈敢容易。守株待兔，莫辯指蹤；常山擊蛇，要觀首尾。若無自得之學，曷成一家之言？垂念臣被旨以還，唯恐弗逮，雖蒙筆

札之賜，不敢官求……（註八四）。

表中首敘勵志苦讀勤勉著書的境況；次對高宗之知遇、勗勉略加頌揚；末段概述修撰該書之甘苦，並表白自己修史「有一日之長」，能「成一家之言」之自負。

但當他到達臨安時，適逢高宗移駕建康，遂無緣得見。之後樵被詔遷為樞密院編修，兼攝檢諸房文字（註八五）。後樵又請求修撰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並以此為理由要求入秘書省翻閱書籍，但此事再次遭到反對而不得實現。據稱原因是一「遇館中人狹中矜性，皆不樂以館中所有易彼所無，竟寢其事」（註八六）。博極群書，整理金石鼎彝都是鄭樵在前述的〈獻皇帝書〉、〈上宰相書〉的願望，但至此始終未能真正達成。這點與知幾際遇殊為不同。

紹興三十二年二月，高宗由建康至臨安，于三月初詔樵進獻《通志》，會樵病卒，享年五十九歲（註八七）。綜觀鄭樵畢生過著枯淡的生活，不慕虛華，亦不切切於仕進，只專心致志於學術研究與著述，是後世難得的典範。其身後家境清寒，有子翁歸年僅八歲，無力付刻，因而其生前大量著作大都未能刊印行世，後來逐漸散佚，今存唯有《通志》、《爾雅鄭注》、《夾漈遺稿》、《詩辨妄》數種以及若干零散斷篇遺文而已，殊為可惜。（註八八）。

章學誠在第二節的最後一年即其四十歲時中舉，次年成進士。四十一歲始中進士與知幾弱冠即中，足足相差二十年。實算不上得意，學誠曾在〈質性篇〉說：

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若夫託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敘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為騷者，且紛紛矣。（註八九）

這段話是學誠夫子自道。蓋文中屈賈遷都是極不得意之人，而學誠於科第亦如是。與他情況相同，倣效屈原作〈離騷〉者多，但在學誠看來，他們都沒有「屈賈之志」，牢騷鄙下味俗。而且學誠在官途亦極不得意。他自己以為與時俗不合，不願作官，致貧困如故，依人為生。〈俗嫌〉篇舉實例以云（註九〇）：

往學古文於朱（筠）先生，先生為《呂學人誌》，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夫曰：「呂生讀書聲高，而

聲即淒悲，豈其中有不自得耶？」其夫告呂。呂哭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聰，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牆三揖。其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

學誠甚至自傷不如呂舉人幸運，呂氏尙有一位知人冷暖的鄰婦。

在這段期間，學誠受友人周震榮的聘請，修《永清縣志》，周氏甚予其便，使學誠周游縣境，調查實情，以三年時間完成此書。乾隆四十四年，學誠在同鄉戶部尙書梁國治家課教其子一年。乾隆四十六年至河南謀事不成，中途遇盜，囊篋盡失，生平撰著亦散佚無存。從朋友處借抄，僅得十之四五。學誠一生的不幸，恐以此次最甚。自是以後，每有文稿，必留副草，以備遺忘。是年其師朱筠逝於北京，「師友知交，凋落多故」，學誠「一家十五口，浮寓都門，嗷嗷待哺，秋盡無衣，困苦最甚」，次年學誠只得離開京師，轉至永平縣（今河北盧龍縣）主講敬勝學院，繼續撰寫《文史通義》。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二），氏四十六歲，春，臥病，甚危急，邵晉涵載至其家，延醫治之。病中喜與邵氏論學，每至夜分。由於邵氏爲之護理，得免於死。四十七歲，由永勝書院轉至保定主講蓮池書院，五十歲退職回京，寄居於朋友家中。此年（一七八七）學誠最得意之門人史致光進士及第，授修撰。亦在此年歲末，因周震榮推薦，至河南見畢沅，甚受畢氏器重，隔年主講歸德文正書院。自乾隆五十三年起至五十八年，學誠爲亳州知州修《亳州志》（今已不存），並爲湖廣總督畢沅編纂《史籍考》，主修《湖北通志》，並參與畢氏之《續資治通鑑》的編撰工作，有《爲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鑿書》》一文。氏所主修之《湖北通志》，在畢沅離武昌赴山東後，廢而不用，但在《章氏遺書》中存有《湖北通志檢存稿》四卷。此期間內，學誠尙修有《常德府志》、《荊州府志》，唯皆不存。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氏五十六歲，將家眷從亳州送回會稽。所有藏書之大部分亦於此時以楠木書櫥十二隻，寄歸故里。隔年，學誠亦回老家。耗時多年的《史籍考》完成十之八九，竟仍不得卒業。學誠出外作客三十餘年，顛沛流離，倍嘗艱辛，回家後葺居僅足容身。但不久又離家游揚州、安慶、桐城諸地，後來才到揚州依鹽運使曾燠。曾氏對學誠亦甚器重。

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學誠六十一歲，在蘇州續編《史籍考》，畢沅死後，是書未成。學誠遂就其家訪得殘餘，重訂凡例，完成《史籍考》凡三百二十五卷。可惜是書終仍不傳。嘉慶五年，學誠因眼疾失明，猶著述不輟。嘉慶六年（一